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

张斌贤 主编



美国教育
经典译丛

伯纳德·贝林 (Bernard Bailyn) 著

王晨 章欢 译

王晨 校



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

美国教育经典译丛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伯纳德·贝林 (Bailyn Bernard) 著

王晨章欢译

王晨校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美)贝林(Bailyn, B.)著;王晨等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12

(美国教育经典译丛/张斌贤主编)

ISBN 978-7-5336-7745-9

I. ①教… II. ①贝…②王… III. ①教育史—研究—美国
②美国—历史—研究 IV. ①G571.29②K7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648号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by BERNARD BAILYN, published for the Omohundr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pyright © 1960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NEWED 1988
BY BERNARD BAILYN. www.uncpress.unc.edu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皖图字第 1210797 号

书名: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JIAOYU YU MEIGUO SHEHUI DE XINGCHENG

作者:伯纳德·贝林

译者:王晨 章欢

校译:王晨

出版人:郑可

策划编辑:殷振群

责任编辑:殷振群

版权运作:陈海燕 杨菁菁

责任印制:王琳

装帧设计:袁泉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3,6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960 1/16

印张:16.25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745-9

定价:45.00元

主 编

张 斌 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副主编

於 荣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研究院教授

陈 露 茜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博士

编 委

(以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贺 国 庆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靳 玉 乐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柳 海 民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马 健 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孟 繁 华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戚 万 学

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涂 艳 国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王 保 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许 明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徐 小 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於 荣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研究院教授

周 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总序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近 30 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了解和研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教育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乃至整个教育界日益普遍的需要。无论是在教育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实践的改进,美国的成果、经验和趋势都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分外关注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的“参照指标”。因此,在中国教育界,“美国教育”实际上早已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专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对美国教育的了解和研究早已超出了某一个或几个学科的需要,而成为整个教育学科的普遍要求。从中国期刊网(CNKI)的检索中可以看到,1980—1985 年间,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论文为 888 篇,1986—1990 年间为 1154 篇,1991—1995 年间为 1383 篇,1996—2000 年间为 1847 篇,2001—2005 年间为 7290 篇,2006—2009 年间的不完全统计为 4743 篇。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甚至是当前,而对美国教育现状所生成的历史过程是明显忽略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诸多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然”而忽略了“所以然”。而如果对“所以然”知之不多,那么可以想象对“其然”的把握会是何种情况。因此,三十年来,尽管关于美国教育研究的课题和成果“与日俱增”,但研究的深度是否随之提高,是值得质疑的。易言之,关于美国教育的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的急速增加,是否意味着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大幅度提升呢?

在我看来,尽管美国教育只有 200 多年的短暂历史,但是,由于美国教育历史渊源的复杂性,由于美国教育是人为设计而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由于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在教育事务中联邦与各州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复杂性,美



国教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我们深受“大一统”政治文化影响的人所不容易真正深入理解的。美国教育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把握。我相信,中国教育界甚至中国公众中关于美国教育的肤浅的、片面的认识其实并不比我们所具有的“真知”少(一个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教育的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评价认为,虽然美国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而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却不如中国。这个评价的新近版本是,中美两国在本科教育阶段的质量大致相当,而在博士研究生层次上,中国与美国存在着差距)。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以更加复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从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次,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美国教育的内在的真实。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从2006年开始,我和我的学生们开始策划翻译一套美国教育译丛,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系统反映20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教育史书系,以便使教育界关注美国教育的人士能对美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具有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学者尽可能完整地了解美国学者对美国教育历史的不断重构的过程,从而扩大和加深对美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这套“美国教育经典译丛”是一个开放式的选题,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包括:埃尔伍德·帕特森·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的《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9);S. 亚力山大·里帕(S. Alexander Rippa)的《自由社会中的教育:美国历程》(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1997);乔尔·斯普林(Joe Spring)的《美国教育》(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约瑟夫·沃特斯(Joseph Watras)的《20世纪美国教育中的哲学冲突》(Philosophic Conflicts in American Education, 1893—2000. Boston: Allyn & Bacon, 2003);L. 迪安·韦布(L. Dean Webb)的《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5)。

这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来自许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杨多文编审、殷振群副编审、张利编辑为本译丛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与以往我所负责的许多学术工作一样,我的学生们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配合(其中也包括部分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是:浙江师范大学於荣教授,厦门大学王璞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陈瑶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陈露茜、李朝阳、崔高鹏,等。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进同学为译丛的翻译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在此对他们的出色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张斌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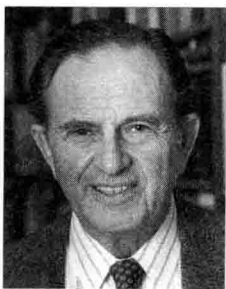
2009年1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版序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非常荣幸有机会向中国读者介绍我的这本教育史著作。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有着相异的历史、语言、社会习俗、政治体制以及观念，以不同的方式审思着儿童的未来和生活。但是我们人性相通，并有共同关怀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教育我们的儿童；如何培养他们，让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如何教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我撰写的这本书致力于解释教育在美国历史的开端时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那一时期，欧洲进入北美的各类团体正在成形中，所以我们能极为清楚地观察到教育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的作用。通过研究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这一主题，我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教育从整全的意义上而言，绝不仅仅只是正规教学，也即是教育不仅仅是指在学校中发生的事情，在教室中所教的内容，尽管这些都极为重要。此书的总体观点是，教育在整个意义上是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其文化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学校中的正规教学，也关乎家庭和社区，而且后者有可能更为重要，它们至少和正规教学一样形塑着儿童的生活。在教室中，儿童被教给许多关于世界的知识，他们接受技能的训练，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但是家庭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了最为深刻和重要的影响，家庭的非正式教育，是在对儿童而言更为根本的世界中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着的。而社区使他们成为社会性的存在，通过社区他们得以知晓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知晓如何在他们所处的公共或独立的机构以及社会组织中生活。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遭到了一些专业教师们的批评，他们感到我贬低了教师的工作，在整体上轻视了教学职业。但这本书丝毫没有贬低正规教学，对于代际间的文化传递而言，对于年青人在世界中成功所需的技能培训而言，正规教学非常关键。此书表明，教学只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只有当它与学生的家庭与社区生活紧密相关的时候，它才能发挥最佳作用。与在任何社会中一样，在早期美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学校中的正规教学只是教育的一个部分。它使得年青人向新观念打开他的心智，教导年青人世界将会如何以其所是的方式来临，如何理智地、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但只有当它将其影响深深地植根在儿童的生活、家庭、社区和普遍的文化中时，它才能发挥最佳的作用。

这就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信息，此书的细节是非常本土化的，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在地球另一头的世界和久远历史中的细节会显得冷僻而费解，但我相信书中的结论与所有社会都是相关的，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社会。

伯纳德·贝林

2012年3月6日于哈佛

译者序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1959年10月16至17日,由威廉与玛丽学院早期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早期美国史研究需求与机会研讨会第三次会议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此系列会议的主旨是针对早期美国史的某些具体领域,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历史观念、历史解释框架和历史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与主题,创造新视野下的研究需求和机会,从而有助于得出对历史关系的新认识和新解释,推动早期美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1952年第一次会议主题是美国早期科学,1953年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美国早期印第安人与白人关系,本次会议主题则是美国早期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被忽略或值得重新研究的领域和关系。会议邀请了当时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执教教育史年仅37岁的伯纳德·贝林撰写主题报告,在大会宣读和讨论后,贝林扩展并修改了该报告,并以报告原名《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为题在1960年出版。

虽然这是一份揭示美国早期教育研究需求和机会的报告,但是其中对早先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及所蕴含的新意识、新主题和新方法,使其成为美国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中期转型复兴时期最具挑战性的批评与评论,它开启了新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框架下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方向。虽然难以具体判断此后的美国教育史研究在多大程度受到了该书的直接影响,因为这需要再一次对美国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程以及学术史脉络做

一番详尽的考察,^①但是它将当时日益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观念、方法与框架集中地引入了教育史研究领域,从而奠定了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坚实基础。^②伯纳德·贝林也因此与库伯莱、劳伦斯·克雷明等著名的开拓性教育史家相提并论。

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 1922—)是美国著名的美国史研究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革命及早期美国史,尤其关注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及建国早期如何发展进入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文化和思想各部分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并就此形成了自己广阔的研究视野、独特的关注点和多样综合的研究方法,以富有历史想象力,能利用被忽视的历史材料,探求不同历史因素之间的联系,提出新异^③却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著称。^④

1949年伯纳德·贝林在攻读哈佛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就受聘为该系讲师(instructor),1951年成为助理教授。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哈佛教育研究生院讲授教育史,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历史系,并于1961年晋升正教授。1967年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

① 至少在贝林最为重视的家庭史领域,他在书中所做的研究假设和提出的研究机会对此后研究的影响较大,他在“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讲中指出,在本书发表后的20年里,关于早期现代英属美洲的家庭生活的著作汗牛充栋,并出现了对此进行归纳和解释的著作。参见: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注释2。

② 但也有教育史学者认为贝林的论述对于教育史而言,并不是新论,主要的意义在于对于历史学界而言会有新的维度和研究发现。Frederick D. Kershner, Jr., Review on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18, No. 4 (Oct., 1961), pp. 579—581.

③ 贝林自己认为他一直寻找的是一种历史状况的独特性,也即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世界的差异之处。一些显见的异常并不能够自我解释,这些异常是进入历史独特性的一种智力挑战。A. Roger Ekirch: “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1, No. 4 (Oct., 1994), p. 654—655.

④ 国内对伯纳德·贝林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有以下文献: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张友伦,“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论点”,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周采,《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第三章第二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涂永前,“译者序”,见伯纳德·贝林著,涂永前译,《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merican Revolution)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和普利策历史图书奖两项大奖,遂声名鹊起,奠定了他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巨匠地位。该书基于他在编纂《约翰·哈佛文库》时所收集的以革命小册子为主的翔实史料,创造性地将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从原有的自由主义引向了古典共和主义,并在大西洋文化圈的视野中揭示了美国革命与欧洲政治文化观念的密切关系,从而突破了以往的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模式,共和主义也成为学界公认的美国革命思想的解释基础之一。

随后他在早期美国史领域持续耕耘,撰写了《美国政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1968),《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经历》(*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 1974),《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洲人口定居中的一次迁徙》(*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986),《革命诸面向:美国独立斗争中的人物与主题》(*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1990),《开启新世界:美国建国者们的天赋与矛盾》(*To Begin the World Anew: 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2003),《大西洋历史:概念与轮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2005)等主要著作。其中《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经历》获国家历史图书奖,《渡海西行的人》再获普利策历史图书奖。^①

—

虽然伯纳德·贝林的主要著作及其研究一直都集中在具体的现代早期北美和西欧史领域,但其中却包含着他自己确立的可用来定位和指导整体历史认识 and 研究的独特历史观念、研究意识与方法,这些观念与方法从他开始从事历史学

① 关于伯纳德·贝林著作的评论和介绍,可参见:伯纳德·贝林著,涂永前译,《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序,第7—8页。

术研究之时就已经基本成型,并贯穿始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① 他个人学术史的展开也就是不断践行、巩固和阐释自身历史认识和研究道路的历程,其研究范围的转换,研究主题的多变,研究方法的多元,恰恰是其宽阔的视野、系统联系的观念与内隐深入的分析在其基本历史认识和研究意识中的内在体现,而不是难以确认其属何种史家身份这一说法的佐证。^②

在伯纳德·贝林看来,历史研究是致力于说明现在这个世界是怎样从过去迥然不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也即人类在其生存的各种基本条件之下为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实现其希望和雄心而自觉地进行及参与斗争的历程。^③ 这是历史的核心任务与神圣使命,是扩展人类经验,并在过去和未来的进程中定位自身,以及形成明智而健全的社会和正确决策的基础。^④ 但这一核心任务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人为的历史猜测、构想与解释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历史的本真还

① 确信至少在1953—1954年其获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及合作撰写《英格兰的文化省份:苏格兰与美洲》一文前后,John Clive and Bernard Bailyn,“England’s Cultural Provinces: Scotland and America,”*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L (1954), 200—213. 他已经基本形成日后历史研究的基本意识,如对现代早期和现代社会转换变革时期的探索,如欧洲与美洲的交汇互动原则的确立,以及英联邦文化圈乃至世界体系中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的传播、扩展、流动、分化和衍生的中心与外围模式设定下的系统性联系观念的形成等。这些观念是其早期教育史、思想史研究、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人口运动和移民史研究、90年代的大西洋两岸研究等阐释的基础意识。在《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一书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意识。关于这些意识的来源、形成与延展以及对自身研究的指导,可参见:A. Roger Ekirch,“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1, No. 4 (Oct., 1994). 在其中,贝林对作为他研究核心的三个交叉点,以及博士论文依据上述原则和观念的选题缘由做了说明。该文系贝林个人学术史的访谈,可作为其学术思想来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另参见: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14页。尤其是“25年前……”一段。该文是贝林1981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讲,可视为对其历史研究观念总结的重要文献。

② 对贝林的史家身份一直以来有多种说法,有认为他是政治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社会史学家、文化史学家、计量史学家、人口史学家、思想史学家、历史传记作家、史料编撰学者,等等。他自己也认为,要成为他所设想的历史学家,进行他所构想的历史研究和叙述,必须成为颇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参见: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③ 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3,396页。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Montgomery Endowment, Dartmouth, 1994:55.

④ Bernard Bailyn,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Montgomery Endowment, Dartmouth, 1994:12.



原性解释至少面临着两种习惯性思维模式的阻碍,一是辉格史观^①,一是时代错置^②。

辉格史观是指以现实的需要和认识为基础,预置一种进步的历史框架和主题,从而将历史过程看做是此框架及主题发展完善的必然趋势,以此回溯性地研究和解释过去与现在。它的优点在于容易形成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但缺点在于它往往会丧失对历史的本真理解,简化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今必胜于昔的进步信念下过于主观地解释历史,并常常会导致为当前的主流观念服务和论证的情况。

时代错置则是指理解者或研究者未能真正地深入过去的事态、条件和情景中对与当前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及其内在联系进行如此所是地理解和解释,而是从已知的结果或从自己所处时代或自身的立场和视域出发,推断、猜测或套用、改造过去的经验,从而曲解或误解了历史,引发了时代错置。这种错误除了主观原因,即视域未能转换之外,客观的原因在于,在久远的过去人的生存基本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往往与我们当前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其斗争的历程中,很多变化和应变是在不可预见的前提下出现的,这些变化在不断变迁之下,已经难以识别其本来的面貌、构成和起源,因此对当前世界的形成性理解就会变得极为困难与复杂。如果不能获得及运用丰富知识和史料进行创造性的想象,从而真正地设身处地深入历史情境中,那这一错误往往会较难避免,也难以自知,并会削弱历史的解释力和价值。避免这一错误需要的不仅是强调当时人们在思考、行动时对结果不可预见的前提,而且要同情地理解失败者;不仅是需要某一点、某一部分或某一片段的历史知识或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对过去时代及其经验的综观式理解,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要求。

正是基于上述史观和对习惯性思维模式的警醒和突破,引出了贝林的历史

^① Bernard Bailyn,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y for Study*. Chapel Hill, Virgini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59; 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② Bernard Bailyn,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y for Study*. Chapel Hill, Virgini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年版,第108—109页。

研究目标、意识、内容和方法。贝林历史研究目标、意识、内容和方法的核心及基础是一种进行全面记述的综合性记叙史概念。这一综合性记叙史要求将历史的技术性研究与分析性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来恢复历史的全貌,把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定量和定性资料、统计和文字资料、视觉和口述资料融汇起来,采用某种记叙结构,以高超的形式撰写综合性的著作,使广阔的历史研究领域有规可循。这种综合性记叙史关注的核心应该为历史上的重大转变、重大问题和关键片段,通过对这些历史关键情节和重大历史发展过程的饶有趣味的记述和综合性说明,向读者重新介绍历史,从而为一种解释当前世界是如何通过演变而形成的通史奠定基础。这种研究既包含轶事,但本质上又不是轶事性质的,它既研究静态的历史形势、环境、背景和观念,同时本质上又是研究动态的历史变化,阐明当前世界的若干重要方面是怎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他说:

“历史学家在此应该是一位记叙者,记叙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复杂、不可预测和瞬息万变的运动着的世界,更丰富多彩地重述过去世界的人们是什么情形?这种情形如何变化、消失并融汇成新的情形?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形又如何?它们如何成为前一阶段情形的产物,并发展成任何人想不到的后一阶段情形?历史学家必须讲述所有这一切,以便帮助人们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情形的,同时使自己的直接经验所涉及的狭小范围得以扩大。”^①

他引用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对纳米尔研究政治史的方法的批评,来作为阐述他所设想的理想型的历史之脉络的例证。这是他在“现代史学的挑战”主席演讲中唯一大段引用的文字,某种意义上说明他认为这段文字极为有力和清晰地阐述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这种将结构和记叙、技术与分析完美结合的本真还

^① 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6、422—423页。

原式的综合性记叙史研究。^①

“在政治结构之上,我们必须有一种用记叙形式展开的政治史:这种政治史是关于人类的记载,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与前途,使情节(story)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并自己做出决定。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历史,即任何时候(无论我们多么了解政治结构和当时的形势),我们都决不能猜测将会发生什么……也许,理想型的历史是在运动中展现出情节和一系列事件,不过,这种情节可以说是被‘彻底地’再叙述一遍,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内容;它把结构与记叙结合了起来……只要历史既是一段情节,又是一种研究,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洞察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时间的进程。”^②

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贝林并没有构建一种元历史学体系对事件进行分层分类,即如年鉴学派那样用某种时间标准区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以此人为地建立历史解释框架,而是强调以具体史实和历史故事本身的发展过程为核心来揭示历史事件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也是他注重细节、人物和事件研究的因由所在。他说:

“史学的精髓和兴味,恰恰在于人类生存的各种基本条件同日常问题之间有着积极的和持续不断的联系,前者为人类的生存规定了界限,后者则是人们自觉参与斗争的东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受到了各种条件的束缚,他们同这些条件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戏剧性事件,乃是一切生动的历史的核心;另外,正是戏剧性事件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对事件进行分类的元历史学体系,给任何有效的历史解释提供了框架。”^③

① 贝林认为这种将分析性历史与解释性历史结合起来的风格和意识深受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影响。A. Roger Ekirch: "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1, No. 4 (Oct., 1994), p. 630.

②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第206—207页。转引自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页,注释1。

③ 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此外,这一综合性记叙史概念可被视为对冲击了西方传统史学和辉格史观的社会史研究的革新和改良。早期或传统的社会史研究结构松散,对各种习惯、风俗、衣食住行方式以及人们为生存而履行的各种义务的描述或研究成果之间毫无联系,杂乱无章,而借鉴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所进行的静态历史研究则刻板机械,从而导致了一种未能以综合性结构化方式对整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及重要主题进行探讨的碎片化状态,资料剧增但是难以融会成连贯的整体,达到历史认识的深刻性。因而以综合性记叙史的方式克服早期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集中叙述西方近现代社会是如何演变而形成的就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如何进行综合性记叙史研究,贝林在承认撰写这类著作难度很大,没有秘方的前提下,认为这类研究可以从社会政治史、思想史或经济史以及几个领域的结合部发展起来,并且必须结合一系列技术性和分析性的研究成果。为此,他从历史研究的实质性内容的发展出发,提出了三个具有指导价值的趋势性原则。^①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学术道路就是在此三个原则的指导下,为最终的全面综合性记叙史做着各种准备。

第一个趋势性原则是将外显的历史与内隐的历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事

^① 贝林在此再次避谈方法论的性质,而是用实际的研究案例指出了趋势的实质性发展,参见: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这再一次说明了他对历史具体而非历史抽象的重视。这种对历史具体的重视与他对综合性理解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他的历史著作的独特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来自于对这两者的良好结合。这一结合应该可以追溯到贝林的大学时期。贝林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主修的是英语文学,并修读大量哲学课程,那时并未修读历史课程或著作,因此大学时代教育对自己历史研究思维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撰写荣誉学位论文时受教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影响,趋向于研究和理解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文学作品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从而走向了文化史;二是学习哲学时因越来越难以忍受学生们对具有爱默生风格,以复杂、晦涩格言形式探讨形而上学的哲学教师米勒(John William Miller)的模仿而更愿意接受理查德·纽霍尔(Richard Newhall)影响,日益倾向经验主义和批判思维,注重客观性、有效性和可验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对历史具体的重视和对综合性理解的追求的根源,也说明其思想的早熟状况,思维习惯的形成过程及其一贯性。参见:A. Roger Ekirch: “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1, No. 4 (Oct., 1994), pp. 626—627. 另外在该文中,贝林也指出社会科学虽然有助于理解历史,但他一直避免直接使用系统性的概念或社会科学的语言及假设或方法论。pp. 653—654.